

F129
C466

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

人类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

陈庆德 著



A0953566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世鸾

封面设计：郭明

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

——人类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

陈庆德 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625 字数：240千

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81068-225-3/C·28

定价：18.00元

前 言

当我们跨入 21 世纪的门槛时，对逝去的 20 世纪颇有恋恋不舍的深情。20 世纪是民族学在云南传播、发展的世纪。50 年代，民族学以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为云南省的民族识别、民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南省民族识别与民主改革的成功，与广大民族学工作者实事求是、认真严谨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90 年代，民族学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提供精神力量、智力支持、人才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表明，民族学在多民族的云南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学科。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在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贡献的同时，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也取得显著成绩，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

云南大学民族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得益于有优秀的学术领导人。方国瑜、杨堃、江应梁三位教授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与学术特长，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都取得国内外公认的成就。作为学术领导人，他们是具有国际水准的学术权威，这固然是他们成为学术领导人的重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杰出的科学研究的组织能力。他们长期立足于本学科前沿，洞察学科的发展趋势，能够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学科发展战略，不断开拓出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作为学术领导人，他们并没有权势，权势和职位虽

然可以带来“权威”，但不能带来智慧；他们的权威在于自身人格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民族学的研究需要学术上的献身精神，以及对本专业发自内心的挚爱。三位教授坚韧执着的敬业精神和严肃正派的学者风范，以及对本专业学术价值的认识，使一个学术群体自觉自愿地团结在他们周围。这个群体淡泊名利，潜心学问，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孜孜不倦地奋力拼搏。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对本专业的神圣使命感、一往无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自己钟爱的学科的强烈自豪感。

求真务实，严谨治学，不淹没前人，要努力胜过前人，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的优良传统。尽管学术造诣有高低，学术观点有同异，但本学科的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淡泊宁静，甘于寂寞，安贫乐道，以踏实对浮躁，以静穆对喧嚣，以清醒对狂热，以求真对作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把学术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钱钟书有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育之事，朝市显学，必成俗学。”在云南大学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人大都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素心人”。“素心”正是保持高尚人格操守和独立学问品格的基石。失去“素心”，面对精彩纷呈的花花世界，不免心动神摇，趋炎附势，摧眉折腰，急功近利，难以保持卓然高洁的人品。失去做人的尊严，又何谈做学问！

云南大学民族学科在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新人辈出，成果丰硕，成为国家“211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经过几年的建设，又取得新的科研成果。我们把这些成果汇集起来，以“民族学文库”为名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尽绵薄之力。我们真诚地期待学者和读者对这个文库提出建议与批评。任何批评都是我们所热诚欢迎的，因为这正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之一。

20世纪在我们眷恋的深情中离去，21世纪在我们希望的渴

求中来临。国内外的民族问题将会是新世纪的热点之一，民族学将在研究民族问题的过程中证实自己的学术价值、开拓自己的学术空间、展现自己的学术魅力，以一批批里程碑式的创造性成果实现新世纪的辉煌。

林超民

于 21 世纪第一天

第一章 导言：历史认识论与民族经济分析

在包容着社会、政治、经济……广阔领域和庞杂内容的社会科学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本质内涵？孩提时代的我，曾一次次为古代先哲的博大通才而震撼，而今日在已被高度专业化割裂的社会科学中，不同的专业学科已把人或社会的种种活动，分裂成自己所特有的研究对象和专有领地，这固然使人类行为的分析得以深化，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人类存在整体性关怀的同样程度的淡化。当社会科学把人类的整体性存在肢解成分离的碎片，按专业划分给同样受限制的各门具体学科，而向人们展示出诸如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文化行为、性行为、社会行为等等的研究成果时，专业分化的要求以及由于这种分化而产生的、局限于精确性的要求等，使各种具体学科沉溺于对人类行为的现象进行“精确”的研究，而放弃了对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其终极目的的思考。使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越来越没有能力去把握人类存在的总体过程。我们不禁要问，对人类的整体性存在来说，这些不同的行为意义何在？从人类存在与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这种种不同的行为又是为什么产生和存在？到底要实现什么？如果能够跨越社会科学如此细密的专业分科，找到它们之间某种共同的联系，看到这种共同关心的主题确实存在，那么，社会科学最基本的职能及其本质意义究竟是什么？简而言之，社会科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对人的关怀。社会科学对人类行为的专门化研究，并非是一种专业技能或知识的炫耀，而是为了实现对人的理解。正是社会科学这一共同的基本职能，为其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铺设了坚实的基础。

§ 1-1 人类发展的本质性要求与实现方式的差异

人是地球生物圈的产物之一，同生物圈的所有成分一样，也要依赖于他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来构建其生存基础。这便聚焦为生物适应的核心问题。生物适应所碰到的主要困难，就是这种适应大都涉及有机体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具有的职能。而人之所以成为人，恰恰就在于人对自己周围环境的积极适应，逐渐脱离了具有纯生物性质的自发适应方式，使人的存在与发展，表现为迫使自然限制退却的过程。这样，人类生存的再生产形式具有了社会性。尽管在直接的日常生活中，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进行的自我再生产，在许多方面被他的生物性上的再生产所掩盖。但是，在由自然限制的退却和社会性的实现所构筑的、使人成为人的过程，已确立了社会性在人类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

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正是在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中，才产生了孤立个人的观点。因此，“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① 这种社会性的主导地位，展示了人类的发展不仅包含着自身统一性的本质要求，同时也包含着实际实现这种统一性的趋向。

青年时代的我常常把公有制理解为马克思学说之所有，而后才逐渐从马克思的原著中，体会出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完善。所以，马克思对现实社会批判的最终依托，乃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等等的最终判断，也只能归结于此。唯其如此，马克思把迄今为止、并将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长期延续的人类阶级社会视为“人类的史前史”的深刻涵意，才能得到正确的领会；也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论断，和“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阐述的真实意义。^①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合类性始终是判断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核心性的着眼点。因此，马克思对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发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国的描绘，其实质并不在于他藉以进行描绘的、某种特定而十分简略的社会图式，而是对一种不产生任何异化的合类性的渴望，并以这种合类性的实现为核心，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描绘与空想主义者的本质区别，不仅在于他客观地、确切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还在于，他不是把这个未来社会视为人类历史的最终结局，而是相反地仅仅把它视为人类本来的、真正的历史的开端。

在再生产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意味着人们的实践活动方式，在社会中自发地产生着分化、集中和多元化。这样，人的类本质实现的一致性要求与人的具体发展方式之间，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深刻的内在矛盾性。在地球生物圈中，其他生物的类存在是一种无声的合类性：即在种系中的每一个个体，直接就是某一个类的个例，群居的动物是类的直接个例，同样，非群居的动物也是类的直接个例。但人却不同，人是以原始的血缘氏族或部落、地域—民族经济体、民族—地区性国家等共同体组织来构筑其具体发展方式的。这些分离的共同体，在人们的心目中，培育起一种有效的类意识的非无声的综合整体。这种整体长久地包含着对非共同体成员的完全或部分的否认与排斥，人类的合类性成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

为了一种不再是无声的合类性，如果说，立于生物性基础上的无声的合类性是一种直接的表现；那么，人类的合类性从一开始就扬弃了这种直接性，它总是需要有意识中介行为，才能执行其职能。于是，人类不再是无声的合类性的发展，分裂了自身的发展过程。这样，“个人与类之间的关系就陷入了一种无法扬弃的矛盾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不可能形成个人与类（因而也与他的合类性）之间的直接的、一般的、直截了当的关系。”^①

本来，人类不再是无声的合类性，作为对自然限制的突破，把对自然的统治社会化；进而在本来的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存在。它使人类从或大或小的共同体联合中，产生出同类实际联合的现实需要。从原始的人类小群体到较大的群体，从血缘氏族到部落联盟，从部落联盟到种族、民族，再到人类统一的现实一体化过程的扩展，人的这些不再是无声的类客体化，也变得愈来愈大。创造了使人类自觉统一于合类性的趋向，并内在地具有一种实现全人类统一的、上升和提高了的趋势。但是，整体的这种不可质疑的进步性的表现方式，却同样客观地在不同层面上与整体处于一种完全相对立的关系之中。尽管社会实践已大大扩展了人们对其类本质认同的范围，但又没有完全停止把处在这种客体化以外的人排除于人类之外。

例如，在血缘氏族组织这一最初的制度框架中，人们从未能通观世界，也从未把“人类”视为同一整体。在血缘纽带的维系下，个体追溯他们的血统直至某个共同祖先。在这其中，“个人的个体同一性也通过与氏族集团的同一性而得到发展，这种同一性是作为在相互作用范畴中被译解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被依次领悟的。由于社会现实还未能清楚地从自然现实中区分出来，社会世

^① [匈] 乔治·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上卷，第 230 页。

界的边界就消失在自然世界的边界之中。”^① 这样，人的社会本质的同一性，仅在血缘共同体的意义上得到体现；个体也仅在这一框架内才实现了相互的认同。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② 在此双重的制约中，只要一脱离共同体，一般说来也就被剥夺了任何一种作为人的地位。由此而形成简单社会的存在，简单到这个共同体之中不再包含其他更小的集合体，而是直接以非独立的个体结合为自身的存在，并以其自身构成一个社会集合体。而当人的不再无声的合类性，从血缘共同体扩展到地缘共同体，即人对自己类本质的认识超越了直接的血缘认同，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广泛的、对间接关系的认同时，也就为民族、国家等合类性藉以存在的发展方式的形成，铺筑了最初的基础。

不再无声的合类性实现人类统一的一体化要求，就这样开启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同时又是极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就在这种以充满矛盾并制造对立的方式来实现发展的进程中，就在这种自然限制的退却和社会性的拓展中，社会展示出从“自然共同体”，到“社会共同体”，再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趋势；人的发展亦呈现了由“人的依赖关系”经历“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最终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变化特征。然而，这种“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来获取人类才能的发展，“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来实现“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的过程，这种分裂了自身发展过程的性质，使马克思把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称为“人类的史前史”。

① [德]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人的异化由此围绕着剩余劳动的核心在整个社会全面展开。而经济的发展，也就成为这个过程无法扬弃的最终基础。

从经济过程来看，社会共同体的这一发展，包容了商品经济形式萌芽、发展和成熟的完整过程，并终于造就了当代为生产而生产的，这一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一方面，由于“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①使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成为人的才能的发展的一种具体形式。另一方面，虽然现代社会曾以“人的发展和解放”的主题，获得并证明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它并未超越这种自我分裂的发展方式，由其带来的人的才能的发展，却不一定必然地导致人的全面性发展；而与人的一般才能的高度发展并存的，仍是扭曲了的人的存在。因此，它非但不能以上述的同样主题，来论证其存在的永恒性，反而招致了当代社会以“人的异化和非人化”的主题对其存在的批判和否定。

就在这种与类本质的分裂中，人作为主体，却被当作物来对待；人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却丧失了自我；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却使自己变成了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因此，在此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人和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的人的保护”。这种发展的变化，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表现在全部生活领域。“因此，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反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页。

而取得了宗教自由。他并没有从财产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财产自由。他并没有从行业的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行业自由。”^①

我们可以看到，从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从而自己也沦为工具的、这种“自然的”对人的本质的残酷扼杀，并产生出商品流通这种物化原则开始，到封建社会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的逐渐转化，再到当代社会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与残酷竞争、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中，迄今的一切发展，只不过是精妙的物化，取代较为简单的物化，在让某些与人类发展已无法相容的物化形式消失的同时，又创造出更为发展的、更为社会化的物化形式，并且还蕴涵着一种执意要向新的物化发展的更为强烈的趋势。

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创造出日益扩大和丰富的经济统一，及其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在经济一体化的支配下，尽管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在经济发展中，无疑存在着种种重大的差别甚至对立，仍然不能否定人们在最终的经济基础方面，形成一种“共同语言”的趋势。今天，这种“共同语言”已经凭借货币、世界市场等交换体系的普遍工具，导致了人类统一的实践。在国家一体化的形式上，它创造出了社会统一体，并展现出这种现实一体化超越国家限制的前景。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经济本质的这种进步性，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退化，“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它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② 就在这种实现统一性发展的本质要求与现实分离性的发展方式的矛盾对立中，

①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9、442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

当代已得到高度发展的世界市场的经济一体化，仍然无法构成自己更高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它使人的类整体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形成了不相一致的对抗性关系。这种对抗，使得类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所给定的诸多具体的个别形态中体现出来，而不能在这些个别形态的统一体中获得存在。

简而言之，人类历史形成的现实发展方式，是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牺牲为基本标志的。如果说，生物圈中的每一物种，每一物种的每一个体，都在为占有生物圈的各种要素，而与其他物种或个体展开竞争。那么，发生于其他物种中的生存竞争是间接的：即主要是通过最大份额地为自己赢得某种双方生存都必需的资源，来使对方丧失生存的条件，而不是直接地捕食或消灭对手。而这对于人类来说，却恰恰成为其生存竞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式或手段。迄今为止的各种人类社会经济形态，都未摆脱得了这一发展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迄今所取得的一切发展和进步，既是作为人的类本质要求实现一致性发展的具体结果而存在的，又在不断地产生出真正实现最终普遍的人的合类性的障碍。尽管在每个发展的行为中，总是包含着以类本质的实现为标准的方向，但就一定的居统治地位的发展方式而言，其所产生的发展方向也可能是否定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人类的整体性发展，表现为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在发展的现实中，一个方面或事物的上升和另一个方面或事物的衰落，往往构成了同一过程并行不悖的两个侧面。这种发展的对抗形式展示出，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不建筑在目的论的基础上；它是多层次的、多向性的发展，而不是单层次的、直线性的发展；它始终是由许多在一定情况下富有能动性的整体，以其相互的关系和作用来推动的一种发展趋势。

于是，不同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方式，必然表现出多样性的特

征。如果承认，考察人类发展的根本性基点，就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那么，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无非是这种不再无声的合类性发展所藉以表现的形式而已。而发展方式的多样性表明，直线型的发展图式和单一因素的决定论，都无法对发生于不同共同体中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因此，基于发展的这种复杂性，“人们决不应把在历史过程的变化中产生的方向等等，直接评价为进步或者倒退。在这种过程中，进步或倒退都有可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趋势”。^①也正是发展的这种复杂性，使得对人类行为的分析和对发展方式的反思成为必要。经济过程与制度要素的分析，正是对社会共同体这一发展的综合考察。然而，它只有拓展到具体民族实存的历史过程中，以对人类发展方式的反思为出发点，这一分析的重要意义才能够充分展现出来。同时，基于对人类发展方式与发展的本质性要求相背离的思考，已为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提出了一个共同关怀的主题。可以设想，如果脱离这一主题，各门专业学科对人类行为分析所作出的种种合理性、有效性的判断，终将失去可靠的依托。因此，实现社会科学对人的理解这一基本职能的重点，就是对所有已发生过的和现实存在的人类发展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它要求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走出“世袭”的狭隘分析领地，以新的综合来更好地把握人类发展的整体性问题。

§ 1-2 人类发展方式的历史认识

人对自身的理解是从其历史的存在而开始的。尽管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基本的统一性，但是，人类所形成的

^①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重庆出版社中译本 1993 年版，上卷，第 38 页。

与自身类本质相背离的、分离性的发展方式，却使人们从这正确的起点走出极为漫长的路途后，仍未能达到对人类文明总体性本质的全面理解。

当人们超越其直接的血缘关系和单一的地方局限，借助于更具文化追忆和象征意义的间接血缘纽带或更为广泛的地缘联系，而形成民族的存在时，不过是人的不再无声的合类性获得了对纯自然状态的超越，而拓展社会化进程的一种存在形式和表现。这种历史发展的存在形式，也同时作为对人的类本质统一性的一种分裂，使人们无可选择地把地域—民族共同体形式，作为现实的发展方式。在这种分立发展的历史存在中，人们不可能对自己类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认识，人对自身的理解，也就陷入了极不合理的狭隘的地域—民族框架中，滋生出一种庸俗的文明偏好，异想天开地把某一地域—民族文明想象成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在这种自命不凡的模糊幻觉中，形成了自我中心论的历史认识观。它把人类绝大部分的成员排斥在类认同的范围之外，人对其类本质的认识由此而限定在一个片面的状态中，并因而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行为的理解。

从根本上说，这种历史认识模式，起源于公元前 3000 年 ~ 公元 1500 年期间的人类相互隔离、彼此区分的单独发展状态。尽管在公元 1500 年以前，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状态，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人类不同共同体之间实际存在的相互影响，已使人们现实感受到了其同类不同部分的相异性。但在这种历史认识模式的主导下，当不同人类共同体以“非类”和“异己”的观念，来加深和强调对同类其他成员的存在相异性的感受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发展权力和存在理由，并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

面的利益)的现象”,^① 提供了道德伦理依据。从而完成了使人的差别合理化的精神努力。十分明显,这种可以暂时令人满意的、用以解释这种相异性的思想,给人类文明进程带来了沉重灾难,它使竞争、冲突、暴行和人类的自我戕害,成为了人类社会每一个进步和发展的代价。

这种陈旧的历史认识模式,也使人类自我理解的历史探索,长期以来不过表现为以各自文明为中心的历史描述。即便是一些对人类相异性具有包容性感受的历史学家,在对相异共同体的理解性描述中,也仅仅形成了一种地理上的统一性观念。如被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撰写《史记》的司马迁等,都尚未认识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阿比,第一个把历史学设想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认为通过考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事件,便可看到人类社会走向统一的过程。遗憾的是,这一非凡的历史眼光,仅作为一闪的思想火花,而隐没在自我中心说的阴霾中。公元4~5世纪,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影响,重新塑造了历史的观念。它竭力要超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容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如果扬弃这一观念的宗教基础,可以看到,视人类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精神,得到了再次的闪现。它展示了人类在其不再无声的合类性的发展中,为全面理解自我、实现人类本质统一性发展的精神努力;这种精神努力也同时表现为人类发展新形式所提出的客观要求。

自公元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持续加强,使得整个地球以加速度日益缩小。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尽管还没有在政治方面融为一体,但技术与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已处于持续不断的升级之中。人类共同体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6页。

间的不同发展方式的存在与差异，已不容再受忽视。这种世界历史的开创与现实的存在，再次点燃了人们对人类历史发展统一性的认识。在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激发下，一大批西方人文学者，如鲍杜安，勒卢阿，让·波丹，波贝利尼埃尔等，一直到18世纪的伏尔泰，维柯，杜尔阁，孔多塞，赫尔德，康德以及格特尔，施吕策尔，米勒等等，重新树立起人类历史整体性的观念，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统一性，展开了历史哲学的探讨和世界历史的编纂。

然而，既然文艺复兴以“人是万物的尺度”为核心，以文艺复兴思想为起点的“人类整体性”的历史观，在仍然囿于分立状态中的人类发展方式的现实规定下，也就给自我中心论的历史观留下了一席之地。如法国史学家德·图摹仿乔威欧所写的《我们时代的历史》，就向我们呈现了一部以法兰西民族历史为中心的世界史。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以人为尺度，就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当这些人文学者满怀进步的观念，把整个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可以扩展到过去和将来的统一过程，并以此为基点，来探索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当代文明的问题，来阐释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基本精神时，人类进步的客观标准便落脚于具象的实存层面，而抛弃了在终极层面上的判断。由此而形成了进化论思想。从比昂多第一次提出“中世纪”一词，到凯勒尔首次以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概念，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鲍秀埃在其《世界通史》中，论证贯穿于各时代的时代精神的进步；维柯以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的划分，来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孔多塞在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人类起源、直到语言发明、文字发明和历史完全成立三大时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十个时期的发展阶段论：1. 原始部落时期，2. 从畜牧到农业的时期，3. 字母文字发明前的农业民族时期，4. 希腊时代，5. 自科学在古希腊的分工至科学的衰落（罗